目　录

概说明朝 …… 1
一　太祖开国 …… 1
（一）小行童与游方僧 …… 1
（二）从九夫长到大元帅 …… 4
（三）高筑墙　广积粮 …… 11
（四）决战鄱阳湖 …… 14
（五）平东吴 …… 17
（六）大明一统 …… 20
二　胡蓝党狱 …… 24
（一）防权臣 …… 24
（二）废丞相 …… 29
（三）杀功臣 …… 34
三　立法定制 …… 40
（一）强化集权体制 …… 40
（二）政权的柱石 …… 46
（三）编民的义务 …… 48
（四）法律与司法 …… 53
四　靖难之役 …… 5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塞王与晚辈皇帝的矛盾 …… 59
（二）靖难之役 …… 64
（三）瓜蔓抄和寄生虫 …… 70
五　迁都北京 …… 73
（一）巩固与发展 …… 73
（二）营建北京 …… 76
（三）十万大军忙运粮 …… 80
（四）天子守边 …… 83
六　空前壮举 …… 86
（一）三宝太监和他的使命 …… 86
（二）七下西洋 …… 88
（三）空前壮举 …… 92
（四）不可倚仗的辉煌 …… 95
七　仁宣之治 …… 99
（一）贤主在位 …… 99
（二）正臣当朝 …… 101
（三）稳健治国 …… 103
八　土木之变 …… 108
（一）瓦剌的兴起 …… 108
（二）武备弛废 …… 111
（三）宦官干政 …… 113
（四）土木之变 …… 118
九　于谦砥流 …… 120
（一）以身许国 …… 121
（二）重整国威 …… 124
（三）夺门悲剧 …… 129
十　荆襄流民 …… 134

（一）天灾人祸…… 134
（二）惨无人道…… 137
（三）原杰抚定…… 143
十一　闭关自守 …… 146
（一）朝贡贸易…… 146
（二）海禁与海盗…… 151
（三）华商血泪…… 160
十二　江陵柄政 …… 169
（一）平步青云…… 169
（二）十年新政…… 174
（三）身后清算…… 178
十三　清官海瑞 …… 182
（一）刚正不阿…… 182
（二）赤胆逆鳞…… 185
（三）巡抚应天…… 187
（四）镇雅俗　励颓风…… 192
十四　阳明心学 …… 196
（一）文武全才…… 196
（二）高扬主体的旗帜…… 200
十五　异端李贽 …… 207
（一）战斗的一生…… 207
（二）童心说与人必有私…… 214
（三）功利主义与至人政治…… 217
十六　人间地狱 …… 220
（一）廷杖…… 220
（二）锦衣卫与诏狱…… 223
（三）东厂与西厂…… 225

（四）阉人大法官…… 229
十七　权阉乱政 …… 231
（一）二十四衙门…… 232
（二）汪直用事…… 235
（三）刘瑾专权…… 238
（四）魏忠贤乱政…… 243
十八　满旗肇兴 …… 250
（一）努尔哈赤建立后金…… 250
（二）萨尔浒之战…… 253
（三）皇太极奠定大清基业…… 256
十九　天崩地解 …… 260
（一）走向深渊…… 260
（二）埋葬朱明王朝…… 264
（三）第三者得利…… 266
二十　金榜题名 …… 270
（一）科举必由学校…… 270
（二）金榜题名…… 273
（三）代圣贤立言…… 276
廿一　文艺成就 …… 278
（一）乱世豪情…… 278
（二）盛世颂歌…… 282
（三）世俗情调…… 285
廿二　科技巨匠 …… 292
（一）李时珍和《本草纲目》…… 292
（二）徐宏祖和《徐霞客游记》…… 295
（三）宋应星和《天工开物》…… 297
（四）徐光启和《农政全书》…… 299

廿三　西学东渐 …… 302
（一）耶稣会士来华 …… 302
（二）西学的输入 …… 305
廿四　三师启蒙 …… 310
（一）先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黄宗羲的崭新命题 …… 310
（二）历史与道德的背反
——王夫之哲学的意义 …… 313
（三）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顾炎武的实学路线 …… 315
附　录 …… 318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概说明朝

明朝的建立是通过武力的征伐实现的，这一点，与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王朝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明朝还是有些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它的开国皇帝明太祖出身的贫贱，为中国历史上仅见；另外，由农民起义军首领建立的王朝，除西汉外，明朝是第二个。

那么，何以出身社会底层又曾做过丐僧的朱元璋会成为明太祖呢？

他的成功取决于他自身和元末政治、军事、社会大环境两方面的因素。从他自身的因素看，目标远大而能稳扎稳打，善于利用时势，既不患张士诚的狭隘，又不患陈友谅的浮躁；恩威并施，赏罚严明，善于用人，既没有宽于笼络以致受人蒙蔽的失误，也没有刻薄寡恩以致部众离心的过错。所以，他在元末群雄中能够由小变大，由弱而强。从当时的大环境看，红巾军主力在中原与元军的厮杀，形成了对他的一道保护墙，让他有机会积蓄力量，同时又消耗了元朝的力量；元朝虽然扑灭了红巾军主力，却陷入了军阀割据，自相残杀，无力再构成阻挡明太祖一统天下的势力。

1368 年，大明王朝宣告建立。新王朝比以往各朝更为集权和专制。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不在于明初的阶级矛盾比以往更尖锐，而在于明朝创立的独特历史过程、明初各政治社会势力间关系的性质，以及人作为万物之灵会从以往历史中学习的能力。

明初功臣多出身农民，只会冲锋陷阵而不懂舞文弄墨；明初的文臣则大都来自江浙一带的地主富户，原本把红巾军当做盗贼看。所以，作为统治阶层两大集团的武将和文臣之间，就难于沟通、融洽，易为皇权支配。而明太祖出身贫贱，做过云游和尚，

不像唐太宗、宋太祖做皇帝前与功臣间已形成主从关系，也不像汉高祖在功臣中有一帮过去的哥儿们。因此，明太祖与功臣的关系，贫贱时与富贵时的反差就特别大，他对功臣也就没有一种约定俗成的信任，于是只有借助于礼法。但是，礼法越是细密，功臣那种哪朝哪代都一样的依仗特权追求财富、不守规矩的行为，在他看来，便越是难以忍受，于是屡兴大狱，把功臣杀戮殆尽，残酷程度超过历代开国之君。

明太祖广揽儒士，善于向历史学习，在历代开国之君中也是非常突出的。鉴于历史的教训，他废除了丞相，兼任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将丞相的职能分散于六部、都察院、翰林院、通政司、给事中、宦官等衙门，在国家权力机关的设置上充分贯彻了“大小相维、内外相制”的原则，使皇权在各官僚机构的互相制约中，获得高度的稳定和强化。

永乐以后，中央出现内阁，宣德时形成司礼监与内阁共同辅政的体制。内阁不是中书省，首辅也不是丞相，因为内阁不能统辖六部与百官，它只不过是翰林院“密勿论思”（作皇帝裁决政务的顾问）职能的专门化。内阁、司礼监对掌“票拟”与“批红”，把皇帝决策的过程程序化和制度化了，有利于正确决策，同时也将皇帝从琐务中解放出来，却丝毫不影响皇帝朝纲独揽。正统以后出现的权阉和嘉靖万历时出现的权辅，都是皇权异化的产物。是司礼太监权大，还是内阁首辅权大，依皇帝的好恶为转移。然而权阉和权辅对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都构不成威胁，这正是明代君主专制高度强化的重要表现。

明代的君主专制也是建立在中央集权基础上的。明太祖废除行中书省，改设三司，三司间互相牵制。但这种体制使得省级政府缺乏必要的自主权。宣德中期，明廷开始向各省派驻由朝廷大臣出任的巡抚，使得省级政府获得了必要的自主权，又不致脱离中央的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地方政治。

明代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的强化，表现为官僚政治与皇权政治的高度发达，而前者又构成后者的基础。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又表现出“法治”的特征。《大明律》制定的审慎，尤其是行政法典的完备，超过以往各朝；而科举制成为选拔官僚的主要渠道，既使入仕者具备了一定的从政能力，又能有效地传播爱民、

特别是忠君的观念，也使官僚队伍的社会成分经常处于流动之中，扩大了统治基础。这正是明朝皇帝从宪宗以后多不上朝，而国家机器却照样可以运转的重要原因。

但是，这种高于历史水平的“法治”也是高度的人治。因为这些法只施之于臣民，而对皇权却没有丝毫的约束力。与“法治”形成鲜明的对照，明朝皇帝比历史上任何朝代的帝王更加借重特务与法外用刑。锦衣卫和宦官二十四衙门，是两大特务机关；廷杖、东厂、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即诏狱）是明朝皇帝行使法外用刑的四大工具，“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所谓“不丽于法”，就是用刑不以法律为依据，听凭锦衣卫的校尉、东西厂的宦官肆意妄为，滥用酷刑。明代专权乱政最为猖獗的宦官刘瑾和魏忠贤，就是集司礼监的批红权和东西厂、诏狱的法外用刑特权于一身，形成明朝历史上最黑暗的宦官专权统治。正因为如此，明代的皇权统治比以往就更为反动。

明朝中央集权虽然高度强化，但与历朝一样，仍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社会。中央和省级政府都很庞大，府、县地方基层政府都很弱小，地方财政也很为脆弱。基层政府除了应付最基本的任务，即征税和审判人命案，此外一般谈不上发展地方经济，组织地方社会。对地方的统治，必须依靠乡绅和豪强。明朝的各级官僚和准官僚都拥有不同程度的赋役蠲免权，使得他们形成一个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在本乡就称为乡绅，他们往往是一方势力。

明朝的行政立法虽然比以往显得发达，地方的行政技术却仍然是简朴而粗糙的，并且很难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明太祖建国伊始，便追求一个建立在小农经济之上，在官僚机器严密控制之下的强控制的、高度稳定的社会，又以强控制、高稳定的小农社会为模板去改造社会的其他部分。他制定了一些奇怪的政策，如不是向市民课税，而是让南方市民到经济残破的中原服劳役，还让市民为官府养马等等。这些政策从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看来，是不奇怪的。正因为大规模立法的洪武时期是以通过强控制达到高度稳定的农业社会为模板去塑造整个社会的，所以，明朝政府的社会管理技术不但一如既往的简陋，在明朝前期还有所倒退。

简朴而停滞的行政技术，使得政府很难将地方势力的发展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于是，政府的政策就处于矛盾的状态。一方面，政府造成了乡绅这一拥有特权的地方势力，另一方面又不允许他们过分扩张，不时运用强制力对地方势力的过度发展予以扼制、打击，如此，中国传统社会的资本积累就很为不易。明朝的闭关自守政策正是应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

明朝闭关自守政策表现为“朝贡贸易”和海禁的结合，它的作用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将海外贸易的利益紧紧抓在皇室的手中，避免因此造成大的地方势力；另一方面，又借此作为笼络远人的一种手段。郑和下西洋是“朝贡贸易”的最高峰。但是，“朝贡贸易”的高成本须臣民付出，而它的绝大部分利益却为皇室独占，因而遭到官员们的反对。为了避免再次出现郑和下西洋的劳民伤财之举，他们甚至将郑和下西洋留下的技术档案也付之一炬，于是郑和下西洋这一空前的壮举便成了中国航海史上的绝响，而地理大发现却为航行设备远比郑和船队简陋的欧洲探险家所完成。

集权与专制制度不允许私人从事获利巨大的海外贸易。但是，随着明朝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把中国也卷入了世界经济的潮流，海外贸易的机会和利润也就更多更高了。于是，走私贸易在 16 世纪中叶便猖獗起来。明朝政府禁之愈严，走私愈是厉害，终于酿成嘉靖年间的沿海倭乱。倭寇中的真正日本海盗不能说没有，但不占大多数，占大多数的是中国的走私商人和依赖海外贸易为生的普通百姓。在走私势力的强烈反抗下，明朝不得不开放了海禁。但这种开放是很有限的，而就明朝政府的主观意图看，不过是“寓禁于征”，并且明政府的镇压造成中国海商势力的中衰，等于把海外贸易的权利拱手送给了西方殖民者。海禁开放后，中国海商的势力并未得到政府有效地保护，在菲律宾的华商屡遭西班牙殖民者的残忍屠杀，而明朝政府却幸灾乐祸。明后期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历史，已预示着二百年后中国的屈辱命运。

近代初期，欧洲人的海外拓展都受到了王权的保护与支持。王权之所以要保护与支持海外拓展，无非是基于对东方财富的贪婪。明朝皇帝的贪婪不在欧洲的任何一个国王之下，当大量

的美洲白银由马尼拉中转源源流进中国后，万历皇帝对贵金属的贪婪欲也被极大地刺激起来，因此而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对臣民财富的疯狂掠夺。他也曾派使者到马尼拉去勘查金山银山，但是，这一举措除了诱发西方殖民者对华商的大肆屠杀外，别无其他好处。之所以有这种差异，乃是由于欧洲的王权尚有封建领主势力以及传统悠久的议会制度的约束，在海外的拓展上，王权易与民间势力达成妥协，分享利益，从而促成了海外事业的大发展。而明朝的皇权建立在中央集权的基础上，并不存在有效的约束。皇权只知如何最大限度搜刮民脂民膏，却不懂得与民间势力妥协，共享利益，共求发展。于是，不仅好事难成，而且反添祸殃。

明太祖属权力欲最强的皇帝之一是没有疑问的。为了保证江山在朱姓子孙中永传不坠，他加强了皇权与专制，杀尽了功臣。而另一方面，他又捡起了已被历史淘汰的亲王分封制。二十余年间，藩王的势力逐渐强大。他的尸骨未寒，便有强藩之乱。兵强马壮的燕王朱棣夺取了侄皇帝的宝座。为了酬谢兀良哈骑兵协助他夺取天下的功劳，并防备建文帝残余势力的反抗，他把大宁都司南徙，收缩北部边防，并迁都北京。然而，在处理与蒙古的关系上，他既没有能够建立彻底的和平友好，而五征漠北也并没扫平犁庭。他在武功上的建树，甚难与洪武名将徐达、李文忠、蓝玉诸人匹敌，也难免有穷兵黩武的恶评。迁都北京对明朝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但造成了后代天子守边的不利形势，也使明朝的基本国策更为内向，更为鲜明地显露出经济落后地区的北方大贵族地主对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小地主和工商业势力的压制。靖难之役后，削藩仍继续进行。到宣德以后，除了几个藩王能继大统，二三个藩王能试演蹩脚的“靖难剧”，某些藩王能发展高雅爱好，在艺术与科技上取得成绩，绝大多数则成为明朝财政的一大赘疣，社会的弃物。

朱棣靖难，中断了洪武以来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的过程。直到仁、宣二帝继位后，才重新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明朝的社会经济出现第二次恢复发展。这一时期的政治也相对安定和清明，历史上称为“仁宣之治”。

然而，仁宣治世犹如昙花一现，明朝随后进入了动荡不定的

时代。童懵天子信任宦官王振，不但把朝廷上下弄得乌烟瘴气，而且也让自己做了瓦剌的俘虏。幸亏还有于谦这样的干国英才，砥柱中流，力挽狂澜，明朝才避免了宋朝的命运，而明英宗也没有成为宋徽宗第二。可是，专制政治总与阴谋、政变有着不解之缘，重造大明江山的英雄竟然死于野心家之手。

自 15 世纪中叶开始，明朝国内不断有人民的起义。当时南北经济的差异很大，北方旱作农业地区由于积累性的过度开发，生态环境遭破坏，水旱灾害连绵不断，农业经济本已很脆弱，加上难以负担的赋役剥削，大贵族地主凭借特权兼并土地，农民被迫背井离乡。如此，明初确立的强控制社会秩序便难以继续维持。但明朝政府仍是抱残守缺，紧抓住原来的户籍制度不放，用惨无人道的方式遣散聚集在荆襄的流民。流民走投无路，只得揭竿而起，用无数的鲜血与生命，方才换取了专制政府允许流民在当地落户的政策。

社会矛盾在明朝政府日益因循、腐败与反动的统治下继续恶化。北方以皇帝为最大头目的大贵族仍在凭借特权兼并土地，垄断各项利业，而南方的缙绅大地主也同样是贪得无厌。皇权的腐败，意味着约束贪官污吏最基本力量的消失，表示着明朝政府从头往下烂。于是，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农民只有拼死一搏。而腐败的政治无法将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转化成巨大的国防力量，明朝的边疆危机也在不断加深。

那些对儒学忠君爱民思想抱有虔诚信仰的士大夫，以世人皆昏我独醒的气概，力图扭转乾坤，刷新政治，清官海瑞与“权臣”张居正都属于这种人物。海瑞更多的是以个人傲霜立雪的高尚品节去感化与振作，而张居正则侧重运用纵横捭阖的铁腕，实际上是以摄政者的权力对政治进行刷新。然而，他们在事业上不能取得成功的结局都是一样的。海瑞这位热血满腔的清官，最后只能“镇雅俗，励颓风”，充做当政者装饰门面的摆设。而权倾一时的张居正，身后更遭家破人亡的悲惨清算。这个王朝已病入膏肓，不可医治。

清算了张居正的明神宗，最集中体现了专制皇权的腐朽反动。他贪得无厌，不惜动用宦官，越过法定的官僚机构，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对工商业者，进行史无前例的直接大掠夺。他不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君道，不理朝政，丧失皇权的基本政治职能，听凭统治集团不同的利益派别互相倾轧，把明王朝引向了灭亡的深渊。于是民变起于内地，后金崛起东北，逐渐形成埋葬明王朝的力量。

昏君明熹宗宠信乳母客氏与太监魏忠贤，使统治集团的派别之争演成生死大搏斗；陕西农民首举义旗，展开了以武力埋葬朱明王朝的斗争。明王朝在覆亡的深渊中越陷越深。

有志中兴而刚愎自用的崇祯帝，无力回天，在“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无奈中，上吊煤山殉了国，存在了 277 年的明王朝宣告灭亡。

李自成领导大顺农民军长驱直入北京，推翻了明朝的统治。但他既对时局认识不清，没有看到处理明朝残留军阀吴三桂的重要性，以致有山海关战役的失败；又没有建立可靠的根据地，于是一败涂地，江山落到了清朝的手中。

明朝虽然灭亡了，但是，在明朝统治时期，人民创造的灿烂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是永存不朽的。文学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文学的重大成就，是白话小说的成熟并且成为了文学的主流。我国四大古典小说名著中的三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完成于明朝，数百年来，一直是人们最喜爱的作品。明代绘画的主要特征，则是文人画的盛行。明代文学艺术这些特征的形成，除了文化上的积累因素外，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社会思潮的变迁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晚明出现的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更是以市民为主要阅读对象的商品化的作品。而从戏剧家汤显祖的杰作《牡丹亭》对“至情”的歌颂，不难看到启蒙主义思潮的踪影。

明朝是一个科举制盛行的时代，知识分子多热衷读书做官，对科学技术并没有多少兴趣。但至晚明，随着经世学风的兴起，许多知识分子不计功名利禄，默默无闻地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李时珍、徐宏祖、宋应星和徐光启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写成的四大科技名著，对我国和世界科技事业的发展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晚明的万历到崇祯年间，在西方殖民者东来之后，欧洲的一批耶稣会士也联翩而至，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为了便于传教，他们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文化，使当时的中国人耳目一

新，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近代科学精神的觉醒注入了积极因素。

哲学是时代思想的核心，而明代哲学的主流则是王守仁的心学。心学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流派，另一派则是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在南宋由大学者朱熹集大成，在元代得到广泛传播，并取得了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地位。程朱理学的这一地位一直保持到清代，并且在近世还时有回潮。心学也产生于南宋，著名学者是陆九渊。但心学直到王守仁出现以前，影响不大，而且王守仁的学说与其说是陆九渊心学的直接继承，不如说是程朱理学的一种逻辑必然。但是，王守仁学说的基本命题与陆九渊学说是一致的，所以又称陆王心学。王守仁学说出现后，得到广泛传播，在明朝后期风行一时，但一直没有取得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地位。如果说理学对中国历史有什么积极意义可言的话，那就是心学在晚明激发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潮流。

儒学是围绕伦理学的中心展开的。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价值问题，即在于论证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人们应该做的，什么是应该禁止的，也就是道德是什么的问题。其次是认识与实践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认识道德并且如何去恶行善，也就是道德修养问题。道德与道德修养，在儒学中称为“内圣”，这是儒学的最主要一面。但先秦儒学也还讲究“外王”的一面，即是经世致用，讲求富国强兵的手段与功业。但是，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内圣”的一面不断扩张，“外王”的一面不断萎缩。发展到宋明理学，就完全以“内圣”取消了“外王”，也就是以个人的道德修养取代了富国强兵的学问，把富国强兵的功业看成是道德修养的必然结果，并且否定了富国强兵功利的正当性。

圣人是儒学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在宋明理学中，天理，也就是三纲五常，是判断道德与非道德的根本原则。做学问、修养的目标就是要克服直至彻底摒弃自己的一切私欲，思想与行为完全与天理同一，成为圣人，这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对于如何“存天理，灭人欲”，程朱派与心学派是不同的。程朱派认为天理是万物的本源，但又是存在于万事万物中的，“存天理，灭人欲”必须通过多读书、多识前贤来达成。心学派则认为天理并不外于人心，人心中的天理本是完全无缺，“存天理，灭人欲”并不

须借助外在的闻见知识，而只要体认内在的天理，这就是所谓的“心即理”。由于心学派把人心与天理等同起来，一方面高度强调了人作为认识主体的能动性，从而动摇了儒学经典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则是把人欲也认作天理，为肯定私欲，肯定个人利益的思潮开启了门径。

王守仁之后，心学分为右派和左派。右派日益和程朱派合流，而左派则发展了王学中积极的一面，并愈加激进。到李贽那里就发展成激进的反传统，表现出强烈的异端色彩。

王学左派的积极意义在于动摇了儒家经典和孔子学说的权威地位，肯定了人欲的正当性，因而具有启蒙主义的性质。

黄宗羲是明清之际的伟大启蒙主义思想家。他在哲学上属于心学派。正是从肯定人欲的角度，他对君主专制做了中国思想史上最为深刻的批判。他犀利地指出，天理并不合理，传统的君臣父子秩序不仅维护了专制君主的一己私欲，而且剥夺了天下人的私欲；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不同，后者并不是前者的自然延伸。他指出：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而是万民的天下。“天下之兴亡，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为了维护万民的私利，建立万民的天下，他提出，必须用维护万民利益的公法取代维护一家一姓私利的私法，必须实行彻底的法治，用法律制约君主的权力，使它为万民的利益服务，这就是“先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不朽理论。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的另一位重要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他在哲学上属宋明理学中的第三派——气元论派，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唯物论的大成。王夫之学说的启蒙意义，在于他从哲学的高度揭示了道德与历史的矛盾，个人的道德修养并不能取代富国强兵的技术，历史的发展也并不遵循人类道德的要求。

顾炎武在明末清初三大家中是以学问家的形象出现的。他对王学末流空疏不学的流弊做了批判，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并发展出一套做学问的方法。但后来由于清朝的专制统治，新的社会因素的弱小，他的经世致用思想被摒弃，而演变成乾嘉考据学，伪古典主义的旋流终于没过了启蒙主义的思潮。

一　太祖开国

明朝人有个说法：中国历史上，新朝的建立最合乎正义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汉朝，另一个就是明朝。这一说法的根据在于：汉朝的开国皇帝高祖刘邦与明朝的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都是平民出身。他们能做皇帝，凭藉的不是父祖的官爵、势力与门第，而是对旧朝已失尽人心与“天命”眷顾时势的顺应，以及自己的才智、卓尔不凡的品格和顽强不屈的奋斗。这一说法不无道理。其实，真正平民出身的皇帝只有朱元璋才算得上。刘邦好歹家里有几十亩地，自己又是泗水亭长，也算是统治集团的一员，可以过嗜酒好色的豪爽生活。而朱元璋则家无立锥之地，生活或是寄人篱下，或是漂泊乞讨，贫贱至极。如此出身的平民竟然当上了大明皇朝的开国皇帝，当然有一番艰辛和不易。

(一) 小行童与游方僧

从朱元璋自己能够追溯的家世看，他的祖先一直都是耕田种地，以农为业。他的祖籍是金陵句容县（今南京市句容县）通德乡的朱家巷。在元朝，老百姓都要被编进各类户籍，承担特定的贡纳和劳役。他的祖父朱初一家被编为淘金户，每年得向朝廷缴纳定额的黄金。可是，句容本地不产金，他祖父必须到外地购买完差。为了躲避难以承受的贡纳，朱初一只得领着全家逃到淮河岸边的泗州盱眙（xūyí）县（今属安徽）开荒种地。僻荒的地方没有官府的勒索，凭着自己的辛勤劳动，朱初一的家境渐有

起色，两个儿子也都娶了媳妇。但土地耕熟了，官府的赋役和官吏的勒索便纷至沓来，朱初一死时，家里又是一贫如洗，两个儿子又走上了父辈离乡背井的老路。

二儿子五四先是迁到五河县为大户种田，后来又迁到虹县（今安徽泗县），50 岁时再迁到濠州钟离县（今安徽凤阳）的东乡。此时五四已有三儿二女，媳妇又腆着大肚子，即将临产。1328 年 10 月 23 日（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了。这个新生命就是 40 年后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元璋小名重八，因为在他父亲兄弟俩所生的男孩中，他排行第八。宋元以来的封建社会，平民百姓是没有权利取名字的，只用行辈或出生日期，或父母年龄合算一个数目作为称呼。元璋这一名字是参加红巾军后才取的。

因为营养不良，元璋小时候体弱多病，他的父母迷信，以为只有菩萨才能救他一命，便到庙里许了愿，给元璋舍了身。

元璋 10 岁的时候，五四老汉为了躲避沉重的赋役，又将家搬到了钟离县的西乡。第二年再搬到太平乡的孤庄村，为一个叫刘德的地主做佃户，元璋就为地主放牛。

元璋从小贪玩撒野，有点小聪明，最会出主意闹着玩，同年纪甚至大几岁的孩子都听他使唤。最常玩的游戏就是装皇帝。别看破衣烂衫，他却会把棕榈叶子撕成细丝，粘在嘴上做胡须，找块破水车板顶在头上算是平天冠，土堆上一坐，让小朋友们一行行，一排排，毕恭毕敬，整整齐齐三跪九叩头，同声喊万岁。

他又最有担当。一天放牛时，肚子饿了，看牛的小伙伴周德兴、汤和、徐达也说肚子饿，元璋出主意，将一头小牛犊杀了，然后大家烤着吃。不一会儿，小牛犊就只剩下一张皮、一包骨头和一根尾巴。这时候，大家意识到无法向田主交待，便互相埋怨。元璋想，主意是自己出的，责任也该承担起来，不能连累别人。拍胸膛说，我一个人认了，大家不要着急。也真亏他想出好主意，把小牛犊皮骨都埋了，拿土把血迹盖起来，把小牛尾巴插在山上石头缝里，说是小牛钻进山洞里去了，怎么拉也拉不出来，小伙伴齐声说好。当晚元璋挨了田主刘德一顿毒打，被赶回家，虽然吃了苦头，丢了饭碗，却因此深得伙伴们的信任，认为他敢作敢为，有事一身当，大家心甘情愿地把他当做自己的头目。

1343 年(元顺帝至正三年)的夏天到秋天,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大雨不止,河水冲决了河堤,淹没了农田、房屋,四处汪洋一片,百姓们逃到高阜地带,搭起窝棚,等待着水退。待水退了,耕种的季节也过了,秋天地里颗粒无收。地方官府呢?闹水灾时跑得比谁都快,水退了就向老百姓勒诈钱财,追讨欠交的钱粮,根本不管是天晴还是下雨。人们没有粮食吃,就吃草根树皮。草根树皮吃光了,就吃观音土。观音土吃进去没办法消化,肚胀得鼓鼓的,不几天,人就死了。有些人不甘心饿死,就吃人肉。不久便又闹起瘟疫来,一个村子一天中死去十几人,甚至几十人。

第二年的上半年,元璋家也传染上了瘟病,不到半个月的光景,就死了三口。先是六十四岁的老爹五四,5 月 18 日故去。没过 3 天,大哥重四也死了。到 6 月 3 日,母亲陈二娘又死了。元璋和二哥重六眼看着大人一个个死去,请不起郎中,也抓不起药,只急得相对痛哭。尤其为难的是家里停着几具尸,手头没有一文钱,一毫银,买不起棺木,老放着也不是办法,无论如何得先找块地埋下才是。可是地呢?自己连一块巴掌大的也没有。想来想去,只好哀求田主刘德,看在这些年来做佃客的份上,发发善心,谁知反而挨了一顿臭骂。最后还是邻居刘大秀娄大娘老俩口心肠好,上门找元璋弟兄,让他们将父母葬到刘氏的地上。当时也没有衣衾(qīn,尸体入殓时盖尸体的东西),也没有棺材,将就着用几件破衣衫包裹了,抬到刘家地上安葬了。35 年后,元璋写《皇陵碑》,还觉得伤心:"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掩埋了父母兄长,兄弟俩发愁何以度日。当时灾祸连绵,田地荒芜,人户凋零,元璋兄弟有气力也无处使,挣不来糊口食,而亲戚则非穷即死,竟没有一个能够投靠的地方。寻思来寻思去,兄弟俩只得打算远走他乡,各奔前程。难舍难分的痛哭,惊动了邻舍。隔壁汪大娘提起当年五四公在于觉寺许愿将元璋舍给佛门的事,备办香烛,让元璋到孤庄村西南的于觉寺里,做了一位小行童(和尚仆人)。

可是,寺里的粮食不久就让和尚们吃光了,元璋当行童才 50 天,12 月 16 日,便被师父打发出门去游方。他虽然不会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